

关于灰坑的再思考

陈大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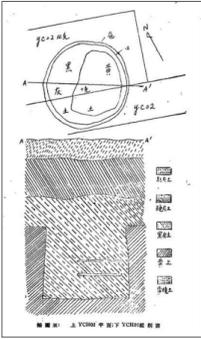


图1《豫东南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灰土坑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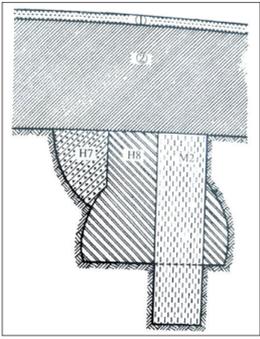


图2 开瑞庄北H7、H8、M2断面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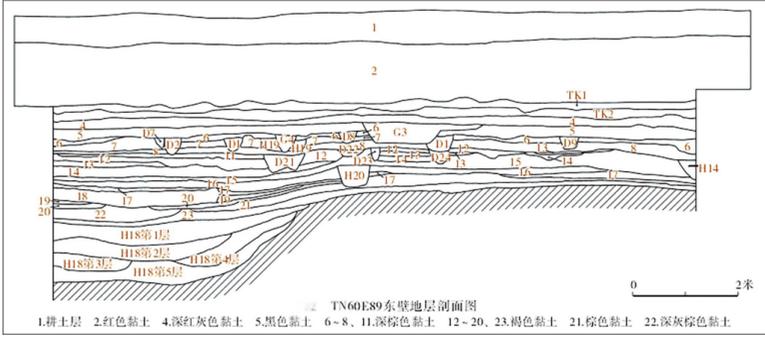


图3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TN60E89东壁剖面图

灰坑是田野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一类遗迹现象，学界对其已有诸多讨论。一般认为它是与人类活动相关的坑状遗迹，包括窖穴、垃圾坑、祭祀坑、陷阱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田野考古学》中对于灰坑的定义“泛指人工开挖的窖穴和用途不明的坑状遗迹”基本包含了这些情况。尽管学界对灰坑的认识总体上已没有太多异议，但关于灰坑的功能性阐释、形成过程及历史信息提取却始终困扰着中国考古学者，对灰坑的定名、内涵、发掘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意义和深化其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定位。

灰坑概念的由来

灰坑的概念是首先要思考的内容。燕生东、付永旭等都指出灰坑是中国考古学中特有的术语，目前英文考古专业名词中没有能与之完全对应的单词。付永旭在《略论“灰坑”的定名》一文中详细介绍了灰坑一名的演变历程，从中可以看到，作为田野考古发掘中最常见的遗迹现象，在中国考古学肇始时，考古学家们便已注意到它了。其名称的演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灰坑阶段（1921年至1934年） 这一阶段，考古学家们虽然已经注意到了这种遗迹现象，但在报告或文章中对其称谓并不统一，多根据其形状称其为袋形坑、坑、方坑、圆坑等，石璋如还使用“穴”对其功能进行了探讨。1934年《词源》报告中则使用了“灰土坑”。这期间灰坑一词还未出现在考古报告或相关文章中。

名称混用阶段（1935年至1943年） 这一阶段，考古学家开始在报告和文章中使用灰坑，但常常在同一篇文章中与其他称谓如“穴”“窖”等混用。付永旭认为灰坑一词最早始于发掘现场，可能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名称很早就流行于田野工作中，只是在正式的简报或研究文章中并未固定下来。但这一时期坑状遗迹的编号系统开始规范起来。成文于1937年的《豫东南商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已经开始将地名、遗址名和遗迹名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应用于遗址、遗迹的编号中。字母H代表灰土坑。（图1）

灰坑的定名阶段（1944年至1955年） 从1944年开始，李济、夏鼐等学者开始在报告和文章中较为规范地使用灰坑一词。自《临洮寺洼山发掘记》（1945）一文后，举凡夏鼐先生执笔的简报、文章已经全部使用灰坑一名。此后，灰坑一词逐渐被学界广泛接受。1952年至1955年举办的四期“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夏鼐、安志敏等作为授课老师将他们对灰坑的认识和定名教授给了学员，这些学员之后也都成为各地的业务骨干，促进了灰坑一词在全国范围的传播。

综上所述，灰坑一词从出现到定名与中国早期田野考古工作主要在北方地区开展有关，特别是与早期发掘的“袋形坑”“灰土坑”有直接关系。李济、夏鼐等先生在推动灰坑正式定名上起到了关键作用。

灰坑的功能性质讨论

灰坑是一个复合概念，包括作为一个空间单元的坑以及坑内堆积两个部分。一座灰坑理论上可以划分为构筑、使用和废弃三个阶段。灰坑可能涵盖窖穴、祭祀坑、房址废弃坑等十余种功能类型。废弃之后，又填埋人各种生活垃圾。关于灰坑性质的判定，早期考古学家已经从埋藏学的角度意识到了坑内堆积与坑本身的区别，不能简单通过坑内的堆积直接判断坑的年代和用途，如夏鼐在齐家文化墓葬（广义的另一种坑）填土中发现仰韶彩陶片，证明填土可能包含早期遗物，不能直接代表墓葬年代。早期考古学者们对于灰坑的认识多停留在现象描述，在类型学主导下的灰坑功能用途的简单推测，主要是为了解决年代学的问题，缺乏对灰坑形成过程的动态分析，功能推断单一化。夏鼐、苏秉琦等早期学者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中，初步提出灰坑与居住活动的联系，但未深入讨论灰坑多功能性（图2）。关于灰坑性质和功能的集中讨论，第一个高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拓古、向鼎较早地开始对灰坑性质与功能进行了专门的讨论，从1999年开始，《中国文物报》连续刊登了数篇关于灰坑用途和性质的探讨文章，吴小平、陈星灿、刘志一、卜工等都发表了自己对灰坑的认识。学者们对于灰坑的关注不再仅仅局限于坑内遗物，更多关注到灰坑构筑、使用、废弃的动态形成过程，体现了考古学从单纯依赖类型学、年代学的物质文化编年到更多关注背后的人类行为模式、社会组织及文化意义的系统阐释的转变。

最近十几年来，随着多学科合作在考古学研究实践中的普及，学界对灰坑的关注度也在增多，从发掘理念到发掘方法到绘图方法都有涉及，宋江宁还从建筑学的角度认为可以将灰坑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类有意建造的，可以归为广义的建筑；第二类是人类有意行为在无意中形成

的，是不规则的。

关于灰坑性质和功能用途的判断是理解灰坑的难点，需要通过各种手段综合性判断，才能获得比较可靠的结论。灰坑功能性质的讨论，本质上是考古学家想通过物质遗存（发掘时灰坑的最终形态）了解其背后人类的行为过程。灰坑的建造目的与最终堆积形态是否统一，正是这一讨论的核心。例如，当灰坑的原始功能（如储粮、祭祀）与最终坑内堆积形态（谷物残留、祭品遗存）高度统一时（坑内堆积和坑本身的一致性），可通过强相关性证据链直接判定灰坑功能。但是现实中往往并不一致，一个灰坑常常经历了建造、使用、废弃等漫长复杂的过程，而灰坑最终的堆积与灰坑原始建造目的的相关性并不那么强，甚至还会出现完全相悖的情形，比如一个储粮窖穴废弃后被填入生活垃圾，这就导致对灰坑的功能判断出现困难，需要另寻证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细化，灰坑作为一个有着庞大内涵的概念，确实有对其细分的必要，对其细分后也有助于后续更深入的研究。

灰坑的发掘方法

灰坑的发掘方法已被许多学者详细介绍过，《考古工作手册》《田野考古学》等书中也有详尽描述。结合本人的发掘经验，特别是南方地区的发掘特点，讨论一下在发掘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几个小问题。

灰坑的判断 田野发掘中，灰坑的判断常常是以坑内堆积的识别为前提。在田野工作当中我们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一个地层发掘完成之后，铲到平面，发现了一些遗迹，把它判断为灰坑，向下发掘之后发现是下一地层的露头。因为地层并不是完全水平的，会有一些起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处理呢？

这种情况需要我们综合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判断。

（1）在剖面的时候，如果感觉这个灰坑开口越刮越大，那这个灰坑就很有可能是下一个地层的露头，特别在南方地区基本可以排除口小底大的“袋状坑”的可能，那它基本上就是下一个地层了，而非灰坑。

（2）如果是人为修筑的灰坑，边界一般都比较规则，界面比较清晰，但露头部分与上一地层的接触面常呈现过渡性渐变（如颜色、硬度），使用手铲剖面时触感上无明显分界，需进一步通过小解剖沟等方式确认。

（3）与周围邻方联动分析，对比相邻探方同层位遗迹现象。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坑内堆积填满之后向坑口外溢出现，这时堆积的边界会出现漫漶不清，甚至类似地层堆积，需要更细致地分析。

灰坑挖到底了吗？ 对于打破生土的灰坑，因为生土和文化堆积的土差异明显，我们比较容易判断灰坑是否已经做到底了，但在田野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一个灰坑打破数个文化层，但没有打破生土的情况，如图3中的H19、H20（图3）。此时，仅凭挖至生土或颜色判断的传统方法已不适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判断灰坑挖到底了呢？

（1）通过观察坑壁的延伸趋势判断是否到底。若坑壁在向下清理过程中逐渐收窄并终止，且底部轮廓与周边地层形成连续界面，则可能到达底部。

（2）剖面辅助判断：对已清理部分刮出新剖面，观察坑壁与底部堆积的连续性。

（3）平面辅助判断：坑开口位置，时间长了，经过阳光照射，土质发干，土色会发生变化，影响判断。在判断灰坑是否到底时，将坑口位置刮出新鲜的面来，及时与底部土质土色进行对比判断。

（4）底部堆积特征分析：底部若出现密集的生活垃圾（如陶片、灰烬层等）或特殊遗存（如铺垫石板、砖块等）则可能到达了最终的使用面。若向下发掘过程中遗物类型突然变化（如出现早期文化层遗物），则要考虑灰坑是否已经挖过了，穿透到下一层堆积了。

（5）如果灰坑底部或边缘因土质土色与周边地层相似而难以判断，可以小幅超挖（约2厘米至5厘米）一点，可通过剖面观察是否已经到底。避免遗留隐患，导致后续层位关系误判等情况出现。

综上所述，上述方法在灰坑发掘的实际操作中需要综合利用，而不是只靠其中某一种方法判断。

结语

灰坑命名首先是基于田野实践的现实

需求，在发掘现场，考古学家面对无法立即判明功能的坑状遗迹时，需要快速赋予其可操作的标识符。在发掘过程中，面对填土复杂、打破关系交错的坑状遗迹，考古学家需在保持记录客观性的同时避免功能误判。早期学者选择灰坑这一中性词汇，既避免功能预设导致的认知偏差，又能满足考古记录的系统性要求。

其次，灰坑最初命名源于填土颜色的视觉特征，早期命名对“灰”的关注，源于黄河流域黄土堆积区的考古实践。北方遗址中，灰土常与人类活动产生的烧土、炭屑、兽骨等共存，形成区别于原生土的“文化堆积”。视觉经验往往具有地域局限性，但也恰好反映了中国考古学发展早期的阶段性特征。

再者，灰坑命名本质上是一种“认知留白”策略。也体现了考古命名的严谨性，这种多样性要求命名系统具有包容性。考古界通过灰坑维持术语中性化，旨在为后续研究预留灵活空间，然而，这一做法也间接导致了后续研究的某些局限性。凡是功能不确定的坑状遗迹都命名为灰坑，这也导致了学者对于灰坑的重视程度远不如房址、陶窑、墓葬等遗迹。

灰坑作为中国田野考古最具标识性的遗迹单位，其研究脉络贯穿了中国考古学从经验积累到理论自觉的本土化进程。这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既是早期考古学家基于北方黄土堆积区实践的直观命名结果，也是中国学界对功能未定遗迹时“认知留白”的智慧选择。从《城子崖》的“灰土坑”到夏鼐笔下规范的灰坑，从单一的垃圾坑认识到涵盖构筑、使用、废弃全周期的空间行为分析，其定名史折射出中国考古学话语体系的关键转折。

作为古代人类活动的“时间胶囊”，灰坑的价值不仅在于灰坑内包含物对于分期断代的支撑，更在于其复合属性所承载的多维信息。然而，灰坑的泛化使用也客观上导致了研究的局限性：功能模糊性使其长期被视为“默认类别”，关注度低于房址、墓葬等明确遗迹。这种命名惯性既反映了早期田野工作的条件限制，也暴露出土语体系与学术需求的阶段性矛盾。如何在保持田野编号实用性的同时，推动研究层面对功能类型的精细化区分（如仓储类、祭祀类、废弃物类），成为当下需要突破的关键议题。

（作者单位：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p>MicroWise system 元智系统</p>	<p>应用场景： 博物馆、遗址区、考古发掘现场、图书馆、档案馆、革命纪念馆、旅游景区……</p>
	<p>智慧保护： 环境调控、环境监测、本体监测、储藏设施、文物展柜、环境运输监测、文保修复实验室装备……</p> <p>智慧管理： 藏品管理、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客流监测、数字资源管理……</p> <p>智慧服务： 数字化采集、数字化展陈、智慧导览、展柜换气率评测服务、熏蒸消杀服务、咨询服务……</p>
<p>西元元智系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MicroWise System Co., Ltd.</p> <p>联系人：张813572270596 座机：029-88346362 邮箱：info@microwise-system.com 网址：www.microwise-system.com</p>	

akzu 让文物活起来，好灯光会说话！

博物馆
展览高标准
照明就用
埃克苏

深圳市埃克苏照明系统有限公司
博物馆和美术馆专业照明产品及解决方案
400-687-2598

牙璋的名称

关于牙璋的名称，最早载于《周礼·考工记·玉人》：“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军旅，以治兵守。”清代吴大澂最早将牙璋一词与实物对应，他在《古玉图考》中记载了一件旁出之牙的方形端刃玉器，并称其为牙璋，其主要依据《周礼·郑玄注》：“牙璋、中璋，二者皆有粗牙之饰于琫侧。”即牙璋柄与身之间的侧缘有向两旁突出的牙齿。吴大澂将此类器物考定为牙璋，此后这一称呼被广泛使用。

但也有不少学者对此类器物如此称呼提出异议，如夏鼐、林巴奈夫、王永波等均提出不同意见，称其为“刀型端刃器”“骨铲形玉器”“粗形端刃器”等。原因有二：其一，研究发现《周礼》为战国时期成书，书中所载各类礼仪、器物的使用高度规范且制度化，过于完善，应为时人对周制的理想化记述；其二，考古出土实物与《周礼》书中记载之物在形态上有相当出入，早期出土的牙璋形制少有与《周礼》所载牙璋相似者。因而，提出《周礼》记载之牙璋，不等于考古发现的“牙璋”。本文采用邓聪先生观点：牙璋由本体、扉牙、柄三部分组成，也即吴大澂《古玉图考》中所订牙璋。

牙璋的起源

牙璋的起源地有多种说法，从已有研究看，牙璋主要起源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目前主要的牙璋起源说法有三种，分别为“山东龙山说”“陕西石峁说”“河南二里头说”。下文对这三种说法作简要概括：

“山东龙山说” 牙璋起源“山东龙山说”被广泛接受，“山东龙山说”以山东龙山文化牙璋为代表，认为牙璋最早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杨伯达、李伯谦、邓聪、栾丰实等学者均认同此说。邓聪等对山东龙山式牙璋进行年代考证和制作技术分析，认为山东龙山式牙璋反映了已知东亚地区最早的古老牙璋的特征，且在石铲、花地嘴等处的牙璋中均可见山东龙山式牙璋的因素，山东龙山式牙璋是其他地区牙璋的来源。而栾丰实对山东四个地点出土的牙璋进行年代考证和类型学研究，认为沂南罗圈峪牙璋时间最早，属大汶口文化晚期，研究的牙璋年代均早于龙山文化早期，表明山东龙山文化牙璋是已出土牙璋中年代最早者；其他地区牙璋是新石器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大汶口文化向黄河中游地区传播和扩散的结果。

“陕西石峁说” 张长寿、邓淑萍等学者则赞同“陕西石峁说”，认为牙璋起源于陕西石峁，以陕西石峁文化早期牙璋为代表，而石峁文化时代晚期。张长寿认为目前刀型端刃器（即牙璋）以石峁遗址出土数量最多，年代最早，可能为此类器物的祖型；二里头文化中的牙璋直接来源于石峁牙璋；而山东出土牙璋文化属性不够明确，不予讨论。邓淑萍观点与张长寿类似，但她认为山东地区出土的牙璋为交易或前朝遗留，是华西玉器向东扩展的结果，而中原地区牙璋的消失与华东的商族西进有关。

“河南二里头说” 部分学者赞同牙璋起源“河南二里头说”，以孙庆伟、朱乃诚为代表。孙庆伟认为山东地区牙璋多为采集品，文化属性不明确，且未曾在龙山文化高等级遗址和墓葬中出现，从而否定牙璋为山东地区起源的说法；而石峁文化出土的牙璋玉质少见且埋藏环境与石峁常见玉铲、玉璜等玉器不同，因此认为石峁牙璋非本土制造，而来源他处。论述牙璋起源“山东龙山说”与“陕西石峁说”的不合理性后，提出牙璋起源河南说，并考证牙璋为夏人的“玄圭”，而山东、陕北等地的牙璋则属夏文化扩展、夏人迁徙及文化交流等原因而来。朱乃诚通过分析牙璋的流传和分布，认为牙璋起源于河南，并把巩义花地嘴出土的新石器牙璋列为夏代牙璋的最早形制；认为山东与陕北的牙璋年代在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之间，由二里头文化传播而来。

结合牙璋的形态、演变研究和所属文化年代看，山东龙山文化牙璋年代最早，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邓聪、栾丰实等对山东龙山文化牙璋起源的系统论述，较能说明山东龙山牙璋的年代、形制等问题，同时也有力论证了山东龙山牙璋为目前最早的牙璋。此外，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基本都是由简单到复杂，从早期的扉牙形态和牙璋整体形制看，陕西石峁牙璋的形态明显比山东牙璋更发达，应当为牙璋发展的一个繁荣阶段。而河南二里头文化所属牙璋更是如此。结合已有的早期牙璋类型研究以及出土年代信息，本文认为，牙璋山东龙山起源说较为可取。

牙璋的早期传播

大汶口文化中后期段起，随着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扩张，其文化影响范围从山东西部扩大到中原地区，并可能间接影响到陕北、甘青等地。大致在这一阶段，牙璋同其他海岱地区玉器一起，传播到了石铲，进而至更远地区。李伯谦先生排定了牙璋发展序列，并提出了早期牙璋的传播路线，即牙璋最早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山东龙山文化，后由东向西传到石峁文化，再西传到齐家文化，而后经巩义花地嘴遗址传到二里头文化。从目前已有研究来看，私以为这一牙璋早期传播路线是相对合理的。此外，李伯谦先生虽提出了早期牙璋的传播路线，却并未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接下来对山东龙山文化—石峁文化—齐家文化—巩义花地嘴—二里头文化的早期牙璋传播路径作简要论述。

牙璋最早起源于山东，再从山东传播至陕西石峁，前文已有论述。对于山东龙山牙璋—石铲牙璋—齐家文化牙璋这一传播路径，邓聪先生曾有过研究。他提出牙璋形制研究的“齿式序列分析法”，验证甘肃天水连珠村牙璋与石铲SSY15、17、18均属兽形齿突形态，应为同一体系内牙璋，将其命名为“石铲式牙璋”，此类牙璋在黄河中下游迄今未曾发现实物，应起源于陕北石铲；而新庄坪牙璋和定西两件牙璋都属于单齿式牙璋，属于山东龙山式牙璋体系。甘肃齐家文化牙璋，既包含来自山东龙山牙璋的因素，也有来自石铲牙璋的因素，印证了早期牙璋山东龙山文化—石铲文化—齐家文化传播的合理性。

通过对比陕西商洛东龙山遗址牙璋与山东上万家沟出土牙璋，可以发现二者形制相似，具有山东龙山式牙璋特征，且东龙山牙璋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已有研究表明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以东龙山遗址夏代早期遗存为代表的东龙山类遗存是两个文化交流的中介。而花地嘴牙璋属新石器，年代略早于二里头牙璋，说明早期牙璋可能通过齐家文化，经东龙山遗址、花地嘴遗址传播到二里头文化。

综上所述，牙璋起源于黄河下游，随着文化的西进扩散传入黄河中游的石铲地区；石铲文化的强盛发展也影响了周边地区，向西给齐家文化带来了牙璋等石铲因素；齐家文化牙璋经东龙山遗址中转至花地嘴遗址，最后在中原腹地的二里头文化再次兴盛。此外，张长寿对比了石铲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刀形端刃器（即牙璋）形制与共生玉器组合，强调了两文化牙璋的相似性，推测二里头文化中牙璋与七孔玉刀直接来源于神木石峁的玉器传统。因而，不排除早期牙璋从石峁文化直接传至二里头文化的可能性。

早期牙璋传播与文明起源同期，牙璋作为一种玉器，其早期传播表现了此期黄河流域各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互动，背后反映出黄河流域牙璋文化圈内形成的政治认同，有助于探讨中华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成等重要议题。

（作者系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版责编：冯朝晖 张宸 郭晓蓉

牙璋起源与早期传播路径

莫恰婧